

##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9月至1949年12月)

### 第四章 斗智斗勇摸敌情 里应外合齐击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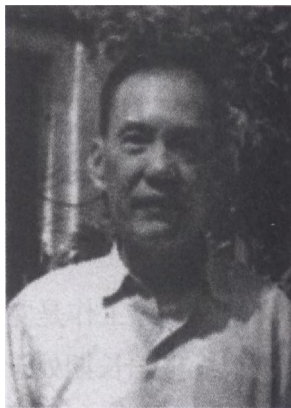
#### 一、广布网站秘搞情报

情报交通工作是党组织和部队指挥作战、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特别在钦廉四属党组织长期处于地下状态，又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的条件下，就更显得重要，它是各级领导的参谋和耳目。北海地区党组织十分重视地下情报交通工作，从1938年中共合浦特别支部建立起，就着手建立情报交通网点，随着党组织深入向农村发展，交通站、点也不断增多。在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逐日扩展，并根据斗争需要不断调整情报交通工作，情报交通站、点更是星罗棋布，形成纵横交错的情报交通网。这些情报交通网仿佛一个人的神经系统，只要触动其中一根，大脑立即有所感知，马上可以采取应变的措施。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有些同志身临绝境之所以能化险为夷，游击队在与敌周旋中之所以能神出鬼没，以少胜多，原因之一是情报交通工作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1938年4月，中共合浦特别支部建立，以特支所在地廉州阜民南路有生号为秘密联络中心，廉州石桥街岑月英家、中山路陈业昌家均是党的秘密联络点。继而在廉州、北海、西场、公馆、白石水柑子根和寨圩简师等地建立党支部，各支部所在地也是党的秘密联络点。1938年底，中共合浦县工委通过国民党一七五师政治部主任林增华的关系，派赵世尧、郭芳等一批党员参加该师的谍报队，收集日谍、汉奸情报，同时利用军队谍报员身份从事地下党的联络工作，出色完成情报交通等任务。

1939年6月，中共合浦中心县委机关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后，党组织吸取了教训，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山区农村，地下交通联络站、点也大部分建立在农村。1939年至1940年间新建起来的交通联络站、点有：廉州的娄行街庐山照相馆、头甲社庞继业家，石康的韩师琪家，常乐的穆业昌家，张黄的农校隔邻（易

志贤、朱菊清)，龙门的李宅（李焯兴、谭家驹），寨圩的简师（陈业昌、耿宪修），公馆的浪坡北楼（徐永清）、山口村（陈铭璧）、樟木山井睦（吴炳宽、吴炳秀、叶杏英），白沙的白沙圩（李成）、白沙宏德小学（刘守业、陈廷）、龙颈（廖世津）、崩岭（钟高球）、陂头下（邹梦生），南康的石头埠小学（陈冠庸），西场的合新绣花店（庞玉全、廖惠明）、凤凰头（王五姐）、九指囊（叶二妈）、白沙头（周杏）、东头村（洪槐权）、大窝塘（黄人川）、薯屋地（李广现），白石水地区的大成山子尾（包宗周）、桥子边村（张清旺），小江地区的潘屋印刷厂（何国达、蔡维中）、马路坡碗厂（保太三哥）等。党组织为了掌握敌情，1940年夏派党员邓松通过与国民党第八区专员邓世增的叔侄关系进入专署工作，先后担任事务员、科员、译电员等职务。1941年增派党员陈耀琪打进国民党“淮海”自卫队任少尉电务员（后改任合浦沿海警备区指挥少尉译电员）。他们两人组成情报组，为党搜集重要的政治军事情报。



谭俊，合浦党组织联络员兼军事特派员。1944年底，他部署了四条通南路特委的秘密情报交通线。

1941年开始，合浦中心县委贯彻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把已暴露身份的党员从原地调到外地隐蔽，并以合法职业掩护开展革命工作。由于大批党员转移，交通站、点也随之起变化，并重新开辟一些交通线。为了加强同南路特委的交通联络，中心县委组织部长谢王岗派何国达、蔡琳前去博白那林建立交通站，开辟了从湛江经安铺、大岭、那林、小江直至白石水的交通线。同时建立山口对达交通站（傅玉峰负责），开辟从白沙宏德经对达，再从海上通往湛江南路特委的交通线。此段时间，许多党员调到新的地区以教师职业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有党员任教的学校多成为新的交通联络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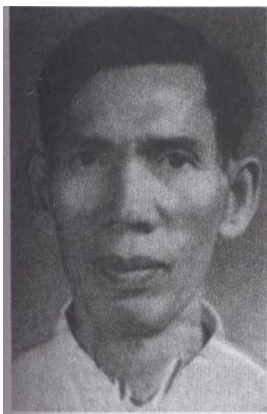
1943年，合浦党组织据上级指示，撤消县委、区委机构，改为单线联系的特

派员制，党的活动更趋于隐蔽。1944年7月初，钦廉四属特派员杨甫在廉州开设永信烟庄，以经商作为职业来掩护秘密活动。此店亦负有情报交通联络任务，灵山萍塘村烟厂（张书坚等负责）、西场天和庄（王克、包恭负责）都和它有联系。

9月，永信烟庄遭受敌特破坏，这些交通站也同时终止。

此后谭俊受广东南路特委指派负责钦廉四属党组织与南路特委的交通联络工作。1944年底，在合浦武装起义前夕，谭俊指定公馆区的刘守仁（白沙梅菜垌交通站）、傅玉峰（山口对达交通站）、廖五十（白沙龙颈交通站）、徐永江（浪坡北楼交通站）、邹才衿（公馆石湖交通站）、陈九思（六湖垌山口村交通站）等，不参加武装起义，留下负责情报交通工作。并部署四条通向南路特委的秘密交通线：一条山路线，由合浦各地通往白沙龙颈——博白那卜旧屋——清平——廉江——湛江；一条公路线，由合浦各地通往龙颈或宏德三小——白沙——山口——清平——廉江——湛江；一条水路线，由合浦各地通往宏德或龙颈——山口（乘船）——廉江安铺——湛江；另一条水路线，由合浦各地通往宏德或龙颈——山口对达（乘船）——遂溪——湛江。这些交通线一直沿用至合浦解放。

1945年，合浦武装起义后，党所领导的武装队伍根据斗争需要，在游击区内建立一些交通站，这些交通站除了为游击队提供情报外，还担负收容伤病员和后勤供给等繁重任务。由于国民党重兵扫荡，斗争极其艰苦，不少负责情报交通工作的共产党员和群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邹才衿，1920年生，合浦县公馆镇元湖村人，194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系公馆石湖交通站负责人。1966年至1967年曾任北海市委副书记。

随着武装斗争的发展，交通情报站日益增多，对交通情报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47年冬，钦廉四属特派员陈华指派姚国厚建立灵山——合浦——博白

——廉江——湛江（边区党委所在地）的交通线，并由姚国厚对交通站进行全面的整顿：一是重新定站名，以利于保密和联系；二是选派政治上可靠的人员担任站长，充实交通站工作人员。如合东南地区在杨桃树村建立交通总站，名为羊站，站长黄文松，尔后黄文松调任指导员，三十二哥接任站长。站内交通员7人，下设18个交通站：海角、捷讯、电波、海马、固本、联报、水波、海丰、海洋、战马、战车、海水、西林、天站、石云、高站、水车、坦克等。姚国厚还亲自前往各地调查了解，绘制出详细的交通联络图，图中注明革命村庄及安全线等，以便于同志们的来往和联系。1947年底至合浦解放，何醒予（何二姐）在公馆香山建立交通联络站，负责与各地交通联络站联系，许多领导常到此住宿、工作或经过。当时该村女青年朱淑兰毅然参加交通站的工作，除积极完成交通联络任务外，还细心照料何醒予（她高度近视，生活自理十分困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她，直至解放。在乌家乡的瓦窑垌设交通总站，站长叶吉莲，与中站相通。钦东特区（三那地区）先后在那丽东侧建立小熊站，在那彭的担坳建大熊站（先是廖贤经负责，后由王瑶仔负责），还建有那思米子站、土地田站。

经过多年广泛布建情报交通网站，革命根据地内部，村与村之间均布有情报交通线。在武装斗争期间，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日益扩展，根据斗争的需要，情报交通站更是星罗棋布，形成纵横交错的情报交通网。1947年底，北海地区共建立60多个情报交通站，其中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北海市区就建立了6个情报交通站；而到解放前夕，北海地区建立的情报交通站达到400多个，情报交通工作人员约600人。钦廉四属特派员陈华通过设在北海的情报交通站，先后视察了钦廉四属广大的山区和农村，了解各地党组织的情况，传达上级关于加强武装斗争、大力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对各地党的工作作了部署和安排。1947年至1948年，北海的情报交通站就接待及护送过多位中共高级干部的往返，其中有中共滇桂黔边纵领导人孙康、中粤桂边区委军事特派员杨应彬、中共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庄田等。除了建立陆地的情报交通站外，通过北海的“展兴”号和越南海防的“公昌行”两个情报交通点，利用帆船运送军用物资和往返中越两国的中共人员。从越南运到北海的军用物资、枪支弹药、电台等，由北海的地下工作人员运



往游击区。

1949年春，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四支队司令部组建后，为使交通情报站工作更好地适应日益发展的解放战争需要，以红旗队（四支队司令部代号）的名义向六万山区各地交通站发出书面通知，指出：“各站今后的人事及情报工作，必须实行统一指挥以便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军事任务顺利完成……”并提出关于整顿健全交通站以及培训交通情报工作人员的五项具体要求。通过整顿和培训进一步健全了各级情报交通网，提高了情报交通工作的效率。情报交通人员以各种手段积极侦察敌情，传递情报，使四支队司令部及时掌握敌情，做到耳聪目明，知彼知己，有效地打击敌人。那时交通站任务极其繁重，除了侦探敌情、传达党的信息以及护送或掩护来往同志外，还需征粮及做好部队的后勤供应，有时要收容伤病人员，以至负责动员群众参加部队等。这一批扎根于人民群众的交通站，是人民游击队可靠的后勤部。1949年夏，粤桂边区第六支队即将进军合浦，合浦党组织通知合东南交通站作好军粮的筹备工作。各交通站立即筹粮，群众踊跃献粮、献菜，仅仅白沙水波站就征集大米、杂粮、瓜菜共100多担。这些交通站在解放前夕普遍为支前做了大量工作。



钦廉四属党组织通往广东南路特委的秘密交通网络图

在严酷的对敌斗争中，情报交通工作是一条十分尖锐复杂的隐蔽战线。许多情报交通工作人员，不分白天黑夜，不顾严寒酷暑，不畏辛劳艰险，把个人的生

死安危置之度外，做出了许多功绩，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仅在解放战争时期，北海地区为党的情报交通工作而献出了宝贵生命的情报交通人员就有：北海的张启泰，公馆的范汝超、陈八哥、朱十七哥，白沙的陈炳芳，营盘的陈锡权，西场的陈国强、吴际堂，福成的陈德权，常乐的李瑞猷，白石水大成的朱桓山、吴忠元、肖主叶、包传绍、朱二嫂、黄亚兰、张祥安，张黄的蔡善文、蔡坤文、蔡大嫂、蔡企文，小江的潘孝彪、刘治材、陈德芳、宋美坤、陈工佳、梁家泰，樟家的赵文海、颜永孚、王献康、刘家奎、余四哥，寨圩的杨宗光、周发文，泉水的刘德成，乐民的韦万升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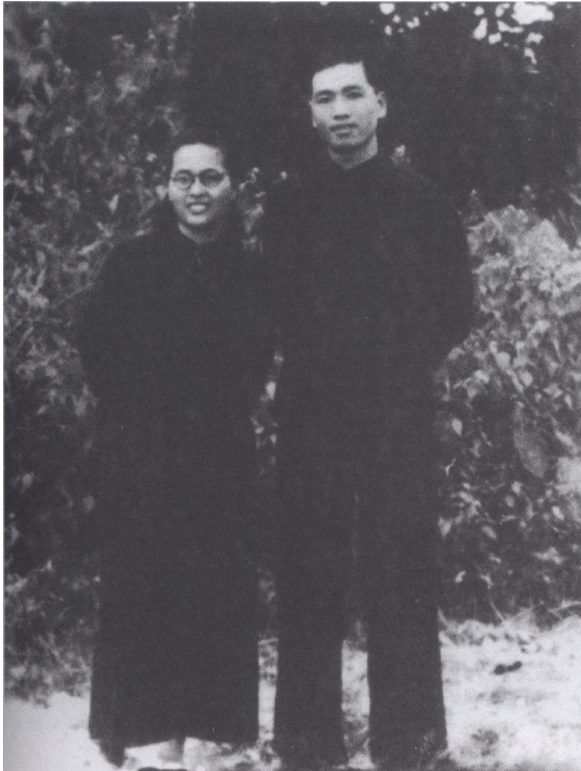
## 二、南撤隐蔽以待时机

北海毗邻越南，从北海到越南的海防海路为 150 海里，从陆路到越南的芒街也不足 200 公里，从民国初年开始，北海就开设了往越南海防的定期班轮。抗日战争以后，北海往越南的客货船更为频繁。因此，历史上两地人民之间的来往十分密切，经北海往越南经商、谋生或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人很多，而越侨到北海求学、谋发展的也不少。20 世纪 30 年代，后任越南民主共和国外贸部部长李班和后任越共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吴其梅就曾在北海的合浦一中读书，与赵世尧、符荣业等进步学生同窗。

1945 年 2 月，南路人民解放军黄景文支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副中队长赵世尧因病从廉江青平返回北海治病。3 月，赵世尧病愈后到广西、博白边境欲归部队继续参加战斗，但找不到部队，只好重返北海。4 月，赵世尧从北海转移到越南，寄宿于族叔赵从宣家。10 月，赵世尧在越南邂逅吴其梅，经吴其梅的推荐，赵世尧到越共华侨工委工作，并主持编辑越共中央出版的刊物《新越南》的华文版。接着，赵世尧派其弟赵世舜回国到湛江购买中文铸字机等，并嘱咐赵世舜到湛江见到庞自、符平等后，将赵世尧转移到越南的情况向广东南路特委报告。

因此，在国民党当局实行“清乡”的严峻形势下，为了保存武装、保存干部，南路特委考虑到把南路无法隐蔽的党员、干部、武装人员转移到越南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决定派庞自到越南，与越共中央联系，协调南路党员、干部、武装人员入越事宜。

12月，庞自到越南找到赵世尧，赵世尧介绍庞自与越共中央领导人认识，并把南路特委请求越共中央允许南路党员、干部、武装人员到越南隐蔽的事宜与越共中央领导人磋商，越共中央同意南路特委的请求。这时，南路各地的党员、干部、武装人员不断到越南隐蔽，从北海转移到越南隐蔽的有伍朝汉、冯德、郭芳、王克等，均经赵世尧的推荐，由越共中央安排工作。转移到越南的钦廉四属人员主要在越南芒街、海防、婆湾（今下龙湾）、河内从事华侨和情报等工作，其中伍朝汉负责越南海防地区开展华侨工人运动和青年学生活动，冯德在越南河内参加《新越南》编辑工作，郭芳和王克在越南海防地区参加公安工作。随后，赵世尧担任越南政治保卫局海防地区负责人，负责调查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在越南的活动情况。



庞自（右）与妻子罗英（左）1947年在越南

庞自，原名庞文隽，1919年出生于北海市，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12月，受党组织的派遣到越南负责协调中共与越共间的有关事务工作。在越期间参加抗法援越战争，先后任越南东北区华侨民众自卫团政治处主任、越南国家军队独立中团政治委员。1952年调到中央劳动部工作，后曾任国家劳动总局副局长。

罗英，原名罗文英，1919年出生于合浦县营盘乡老鸦笼村，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2月，受党组织派遣到越南，先后在华南分局驻越机关、越南国家独立中团政治处工作，曾任中团后方军需处机关党支部书记。1955年调到中央劳动部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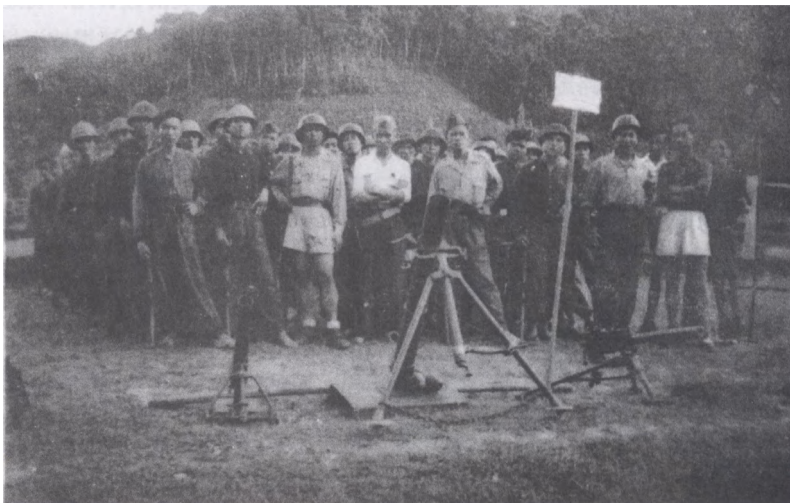
1946年3月，南路特委再次派庞自到越南，以中共广东南路特委正式代表身



份驻在河内，代表中共广东南路特委与越共中央联系，负责中共广东南路特委与越共中央之间的联络沟通工作和对南撤人员的领导工作。接着，庞自按照南路特委的指示，成立“华侨工作组”，联系南撤人员，并进行审查和加强思想教育，帮助解决就业。庞自还按照越共中央组织部长黎德寿的意见，参与主持越共华侨工委的工作，动员和组织华侨支持和参加越南的反法斗争。随后，为了进行革命宣传和筹集活动经费，庞自又与越共合资兴办华文印刷厂，出版华文报纸。6月，南路特委又派陈恩作为中共广东南路特委的代表到越南，与越共中央联系，负责对南撤人员的领导工作。7月，陈恩派赵世尧前往香港，将越南革命概况及南路地区南撤人员的工作情况向中共广东南路特委书记周楠汇报。

这时，中共中央对南路地区南撤人员也十分关注，指示广东区党委派周楠到越南，负责与“越盟”（越南劳动党前身）的联络协调工作，加强对南撤人员的领导。8月，周楠到越南后，派支仁生与赵世尧联系，介绍饶华等参与筹办报刊《华侨生活》，将《新越南》改为《华侨生活》。通过举办华文学校、发行华文书报等形式，在华侨中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实行独裁的阴谋，对撤离到越南的国内同志进行接待安置，并动员华侨参加越南人民反法斗争。

南撤，是在人民革命斗争受到严重威胁、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南路特委依据实际情况，利用北海和越南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为保存革命力量、扩大革命斗争的回旋余地，以坚持革命斗争而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为南路保存了一批党员、干部和武装骨干。华侨工作组成立及其开展的工作，又为尔后将南撤人员输送回国参加解放战争作了准备。



庞殿勋等人隐蔽在越南整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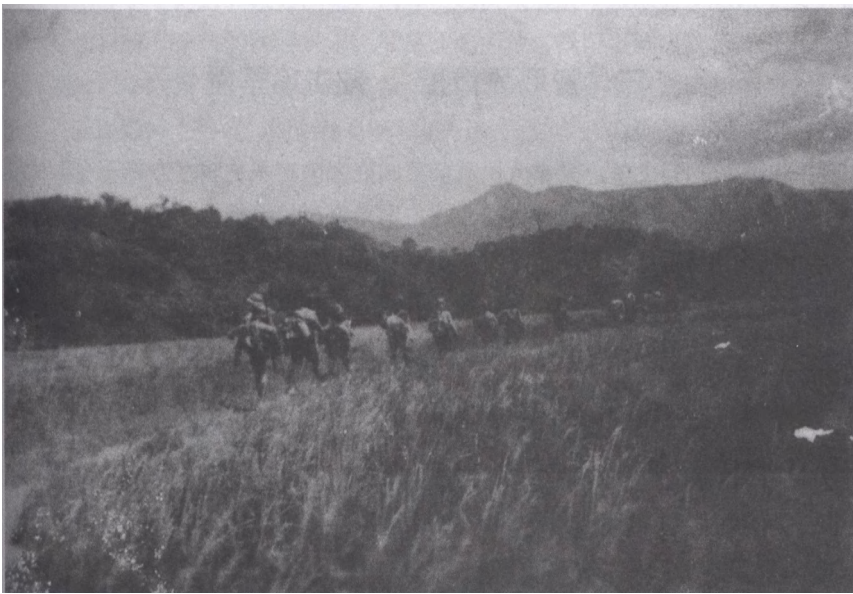


历史

历史



越南国家军队独立中团排以上干部（后排右一：庞殿勋，右二：黄炳，右三：庞自。摄于1949年）



庞殿勋率队回国参加解放战争



庞殿勋(1917-1950)，合浦县西场镇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参与发动西场武装起义；1946年初南撤隐蔽到越南，曾任越南东北部华侨民众自卫团第一大队队长、越南国家军队独立中团一小团团长；1949年夏，奉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之命，率领华侨武装500多人回国参加解放战争；1950年6月在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

### 三、智取敌情报 截击冯军需

1946年5月4日上午，灵山人民武装黄武高大队在圣化乡（今佛子乡）大坡鲤鱼塘村路段，伏击了国民党广东省保安司令部少校军需冯焯明及其护送队伍一个连。此次战斗发生在敌人眼皮底下，仅20多分钟便胜利结束战斗，使国民党灵山县当局大为震惊。

这次战斗之所以能准确地伏击敌人，是党组织派刘业铿<sup>[1]</sup>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敌人行踪的准确情报起了关键性作用。

冯焯明是刘业铿的表姐夫，黄埔军校毕业。在抗日战争中，他贪生怕死，借故隐退回家，曾跑到刘业铿家避难。抗战胜利后，他感到接受胜利果实有油水可捞，便通过原黄埔军校同学的关系，跻身于国民党广东省保安司令部，当上了少校军需。

1946年3月下旬，一个下着毛毛细雨的下午，10多个带着武器的国民党兵突然闯进刘业铿家。刘业铿以为是国民党反动派来抓他，即带手枪躲上小楼，注视着这批人的行动。他定神窥看，发现走在前头的竟是自己的表姐和表姐夫冯焯明，还带着几只大皮箱。这批人到客厅后，卸下了武器。这时刘业铿才放心地把手枪藏好，大大方方走下楼来和冯焯明夫妇见面。

寒暄过后，从刘业铿表姐的谈吐中，得知冯焯明从省保安司令部那里，讨来了一个到灵山催解军饷的差使，顺便私带鸦片烟四、五百两到灵山贩卖，从中捞钱。但由于对灵山县情况不明，不敢贸然直进，便在一个班的武装护送下，从广州乘船到横县的四官渡上岸，取道百合圩直到灵山县平山乡灵家村刘业铿家。他们以为，这样既可找亲戚帮助推销私货，又可探听灵山游击队的活动情况，然后再到县城解粮款，可以万无一失。

刘业铿获得这一重要情报后，心里既高兴又为难。高兴的是，党的武装队伍在长期斗争中，给养较为困难。冯焯明这次来催解军粮款兼走私，手头上有钱，身边只有一个班的武装护卫。如果能吃掉他，既可以解决队伍部分经济困难，又可以夺取敌人的武器，增强队伍的战斗力。为难的是，冯焯明是自己的表姐夫，表姐为人善良，刘业铿自小和她一起长大，要和这样一门亲感动干戈，又有些于

心不忍，因而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是徇私忘义，还是大义灭亲？这时刘业铿想到陈铭金（灵山党组织负责人）背叛地主家庭，投身革命，为穷人谋翻身、求解放的事迹，用他的精神勉励自己。冯焯明虽是自己的表姐夫，可他现在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帮凶，对敌斗争怎能讲亲情？于是，刘业铿毅然决定，立即向陈铭金和大队长黄式高汇报。领导得了情报后，当即指示：密切监视，随时报讯，伺机行动。

冯焯明在刘业铿家住了六、七天，推销部分烟土后，准备前往灵山县城。在启程前一天，他当刘业铿父亲的面提出要刘业铿跟随他一同去“捞世界”，刘业铿父亲对此很高兴，而刘业铿顿感突然，随口问道：“我是蠢人一个，跟随您出去能做什么？”冯说：“只要你肯跟着我，保证有官当。”接着又说：“明天就请轿，后天到灵山，你就随我一同去。”这时刘业铿想，到反动军队里去工作，虽说有利于掌握情报，但是未经请示领导，是不行的。刘业铿为了争取时间向领导请示，只好推辞说：“我是灵家小学的董事，有些事务要交代清楚才好离家。”冯也觉得有理，加上烟土没有销完，决定推迟起程时间，并征求刘业铿的意见，何时起程，走哪条路，刘业铿一一作答。

当晚，刘业铿把事情经过写成报告，派交通员陈均进迅速送给黄式高，建议游击队在佛子圩附近伏击。谁知情报刚送出去不久，冯焯明突然决定提前一天进城。情况突变，使刘业铿焦急万分，只好再派其弟弟刘业钦赶到灵东游击区向领导作补充报告。

第二天，刘业铿作为冯焯明手下的一名“少尉军官”，跟着他们一班人马开赴灵山县城。陈铭金（灵山党组织联络员）、黄式高（南路人民解放军灵山黄式高大队大队长）在接到刘业铿的情报后，经过分析研究，认为军粮款还未到冯的手中，时机尚未成熟，因此派人到佛子圩边等候，要刘业铿继续潜伏等待时机，并指定陈均进与刘业铿联系。

当刘业铿和冯焯明等一班人马来到佛子圩边时，就装着要小便的样子靠近上级领导派来的陈均进，陈将领导的决定告诉刘业铿。刘业铿警觉到冯此时很注意他的行动，所以刘业铿只听陈均进说，并不作答。但刘业铿与来人的接触引起老



奸巨猾的冯焯明的注意。刘业铿从小便处回队后，冯即追问：“刚才那个是什么人？”刘答：“不认识。”冯又问：“不认识，那他怎么跟你说话？”刘答：“他问我们去哪里？因为我不认识，所以没有答话。”冯问不出什么，见刘未同他说话，也不再追问了。

到了灵山县城后，冯焯明夫妇与护送他的一班兵住进保一团团部（周家祠堂内）。刘业铿为便于与陈均进接头，借口方便推销鸦片烟，住在竹行街的亲戚家，每天三餐都往保一团部与冯夫妇一起吃。

自从刘业铿跟冯焯明夫妇进县城后，陈均进按照领导的指示，挑着货郎担，每日都在保一团部驻地周围街巷游转，以接应刘业铿送出的情报并传递上级的指示。

冯焯明等人在县城一住就是10多天，鸦片烟已经销完，军粮款也已由县政府解来，钞票整整装满了三只大皮箱。但是始终看不出他要走的意图，更摸不清他要走哪条路，刘业铿心里很焦急。虽然刘业铿曾多次试探，但冯焯明始终不露半点风声。如果不把这个情报送出去，刘业铿就没有完成任务，一定得想办法。刘业铿从冯焯明处打不开缺口，决定从其表姐那里去解开这个“谜”。

5月1日，表姐的心情特别好，她一清早见到刘业铿，就约刘到中山公园散步。表姐要刘赶快把烟款收完，并雇定三乘轿子，后天早上在镇北街口接龙桥头等候，准备返广州。但是什么时候动身？走哪条路？她没有说。刘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故作为难地说：“定轿是要钱的，不知路程远近怎好定呢？而且要三乘轿，哪有这么多人坐？”

表姐说：“要钱给他钱，先到灵家村你家。至于要三乘轿，我和你表姐夫一人一乘，还有一乘是你坐的。”

这时刘业铿装作不放心的样子说：“这几天有些路不够安定，不知……”表姐看了看周围没有人，便细声地对刘业铿说：“不用怕，这里派一连人护送，先到你家，然后再从那里回广州。你表姐夫本来不准乱讲，但你是自己人，我才对你讲，你千万不要同旁人讲。”刘频频点头答应：“是！是！”由于谜底已揭开了，刘心里高兴极了。

刘业铿马上写好情报，借口催收烟款尾数，与陈均进联系，让他把情报迅速送到游击队。刘建议部队于5月3日上午8时前后，在佛子圩附近的鲤鱼塘村前路设伏击。到时，刘将穿白衣蓝裤和坐第三乘轿，以便同志们容易识别。

5月1日，情报送到游击队根据地大怀山蓬葵麓，陈铭金和黄式高、梁振威等立即研究作出战斗部署，集中队伍进行动员，挑选了80多名战士组成突击队，由黄式高亲自率队开赴大坡村集中。

大坡村是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群众基础很好，西去15华里是灵山县城，驻有保一团及县自卫大队约1000多人，东距佛子乡公所仅有3华里，有乡自卫队一个中队。在这里设伏，要求隐蔽严密，作战神速，不然就会有被敌吃掉的危险。2日晚，队伍隐蔽进村后，80多名战士住在进步群众谢传书、谢孔书的家里。大家严守纪律，保持安静，紧张地等候着战斗时刻的到来。3日凌晨，战士们匆匆吃过早饭便摩拳擦掌地准备投入战斗。天亮后，挂钟已敲响8点，但前哨还没有派人回来报告任何情况。黄式高有些焦急了，战士们也交头接耳地小声议论着，都在分析可能发生的意外。正当大家等得不耐烦的时候，忽然接到刘业铿从县城送出的情报：冯焯明今天只雇轿而不动身，起程日期改在4日早上。黄式高对战士们说：“我们的对手是个狡猾的狐狸，雇轿不走，是想试探我们的动静。”要求战士们坚持隐蔽，保持高度警惕，不能有任何松懈。

4日早晨，冯焯明一行从灵山县城出发，几十名荷枪实弹的保安队官兵伴随着三乘轿子，走在通向佛子圩的大道上。当走到接近甘屋村的大步江时，刘业铿假装肚痛，借口去大便，冯的勤务兵也留下，站在路边等刘业铿，其余的人继续前进。

当冯焯明等一队人马进入伏击圈的时候，黄式高一声令下，密集的枪弹和手榴弹飞向敌群，敌人措手不及，死的死，伤的伤。冯焯明刚从轿里钻出来，就被突击队击毙。突击队指挥员下令冲锋，战士们跳出掩体，勇猛冲杀，敌兵四散奔逃，纷纷夺路向县城方向逃命，武器、钞票、各种物资撒满路上。突击队稍作追击，便迅速打扫战场，胜利地撤回根据地。此战共毙敌冯焯明等13人，伤敌20多人，缴步枪20多枝，手枪1枝，子弹3000多发，钞票3皮箱，军用物资一大

批。突击队战士梁起初、黄振佳受重伤，后无法抢救而牺牲。

这次战斗，震慑了敌人，鼓舞了人心，在当时灵山革命队伍处于困难的情况下，解决了部队的经济给养，补充了部队的武装装备，对后来队伍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1]刘业铨，1925年生，灵山县平山乡灵家村人。1945年2月参加灵山武装起义，担任游击队的情报交通员，后曾任游击队排长、副队长、合灵区委组织干事。解放后曾任中共钦州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

#### 四、龙颈村脱险记

1946年夏天，合浦县白沙乡地下情报交通员廖世津和周洪英、朱香廷（朱八）、李永成、刘贵等5人遵照上级党组织指示，回到白沙乡龙颈村一带开展游击战。由于敌人经常进行清乡“扫荡”，他们白天只能在山上掩蔽，晚上才到各村宣传发动群众，发展武装队伍，工作十分艰苦。

7月17日晚上，廖世津等在龙颈村附近村庄活动，工作结束后，露宿在龙颈村西面的小山林里。因整夜下雨，蚊虫又多，大家无法休息。第二天天刚亮，他们又出发去观察敌情，看到农民已下地耕作，四周没发现可疑的迹象，便打算进村休息一下。没想到，他们进村不久，国民党军一个中队就从后背山偷偷插过来，把村子包围了。群众发觉后，即转告廖世津母亲：“‘牛骨头’来了，‘牛骨头’来了！”廖世津母亲急忙跑回家中叫起他们。情况危急，他们5人立即向村子后背山小门（专为方便廖世津等人出入而开的）猛跑，准备从此处突围。刚跑到门口，突然听到一声大喝：“不准跑！”原来，敌兵已守住了小门。他们只好往回跑，转突南门。刚出南门口，廖世津跌了一跤，又看到门外也有敌兵守着，不敢直冲，便和朱香廷、李永成、刘贵等4人退了回来。周洪英则拼命冲了出去，只听到村外一阵猛烈的枪声，廖世津他们都以为周洪英牺牲了。廖世津立即找到村中几个地下工作人员，对他们说：“敌人不会发慈心的，我们要准备坚决的战斗。”大家暗下决心，若被敌人发现，就同敌人拼，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二个有赚。于是打开手榴弹盖，把子弹推上枪膛，便分头找地方隐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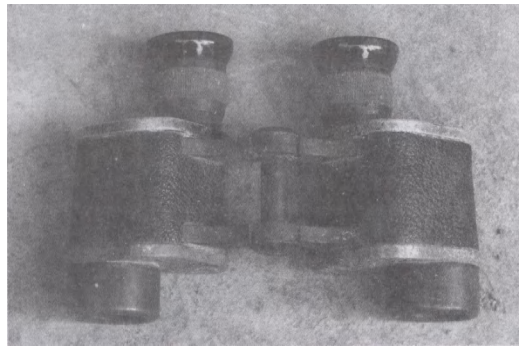
朱香廷跑到廖廿九婶家一个地洞（廖世津等人为应付紧急情况而挖的）钻了



进去，因洞里有积水，湿冷难受，只好离开地洞。廿九婶急中生智，让朱香廷躺在火房角落，搬柴草盖在他身上。李永成、刘贵两人藏在一个旧粪坑里。恰巧那天村里一户人家为死去的老人做斋，廖世津在屋后烧了一些文件，就到道场去找一件道服穿上，扮成道公老，以便窥察村中动静。这时，敌人已在村外布置好警戒，兵分两路，从东、西方进入村里。敌中队长李绍荣看到一家门前站着神态惊惶的老人，便高声发问：“刚才往外跑的是谁，为什么要跑？”老人们回答：“是做工放牛的，因为你们乱打枪，他害怕就跑了。”李绍荣便要甲长把群众赶到村中晒场集中检查。待群众来齐后，他便开始训话，装模作样地说：“你们听着，如有窝藏共匪者，全村受诛；知情不报者杀头。”并声称要斩草除根。



廖世津



廖世津使用过的望远镜

在敌中队长训话时，村民们便暗中示意廖四海（原系国民党军排长，被打散队伍后跑回家中，有胆识，有正义感）和廖廿六公出去应付敌人。廖四海那天穿着国民党军服装，他们很客气地对敌中队长说：“兄弟来这么早有什么事？辛苦啦！”敌中队长说：“来剿土共，还有藏在屋里的吗？”廖四海回答说：“没有，还有谁敢收留土共，去年共产党队伍打白沙乡，事后乡长杨道平组织乡保队到我村搜查，抢劫一空，还放火烧了房屋，搞得全村人至今心惊肉跳，还有谁敢再收留土共呢？”一些年老的群众趁机七嘴八舌地骂开了，有的说杨乡长仗势欺人，是十足的恶霸。有的说，杨杀人放火抢劫财物，还强夺民女为妾，实际上是土匪。还有的说：“杨道平到处‘清乡’抢劫，搞得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望中队长主持公道，为我们伸冤。”敌中队长听后，自知群众不仅是骂杨道平，实际也在骂自己，因此就很恼火地说：“不要吵了！”廖四海趁机说：“这些事实四邻皆

知，请兄弟看看，村中哪里还有一只鸡狗？哪里还有一间好房屋？”说完又半请半拉地带敌中队长到附近察看，只见到处是破盘烂钵，残垣断壁……经群众这样一闹，敌中队长被搞得烦躁不安，敌兵也个个情绪低落。他们向当路的门户察看一下，没发现什么，又看到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便集中队伍打算撤走。廖廿六伯便顺水推舟说：“兄弟们还未食饭，我带大家到保公所吃饭。”于是敌人就跟着他到鷓婆洞保公所去，就这样撤离了龙颈村。



白沙乡龙颈村党支部旧址——廖氏祠堂

原来，敌中队长李绍荣不搜村就带队撤离还另有原因，他的老婆是公馆南山人，游击队曾通过他老婆警告过他，叫他不要到处围村捉人，若做损害共产党和群众的事，决不饶他。这次他奉命带兵搜查龙颈村，只是为了应付差事，因此，未敢认真搜查便撤退了。

廖世津等4人脱险后，正为不知周洪英的下落而担忧。不久，周洪英却回来了，其余4人见了他，都惊喜地说：“周队长，你是人还是鬼啊？我们以为你已去见马克思了呢！”周也风趣地说：“我也以为你们到马克思那里去联系工作或变成猪公（指俘虏）了呢。”说得众人开怀大笑。原来，周洪英在冲出南门时，见门外两边都有敌人，便硬着头皮猛跑，敌兵见喝叫无效，便慌乱地朝他打了10多枪，这时周洪英已跑出30多米之外，因雨天路滑，摔了一跤，敌人误以为把他打伤或打死了，就停止射击，追赶也放慢了脚步，周洪英趁机跃起猛跑，三拐两拐便钻进了山上的小树林，脱离了险境。他又急忙到园得岭村吴三伯家，借来笠帽和铁锹，扮成看护农作物的农民，带几个地下党员到龙颈村观察动静，准备

援救廖世津等4人。确认敌人已撤退后，他们便进村来会合廖世津、朱香廷、李永成、刘贵等。

## 五、“四眼刘”被捕变节 情报网遭受重创

### ——记“四眼刘”事件

1947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廉北联络员廖铎（又名刘鑫、绰号“四眼刘”）被敌人逮捕，旋即叛变投敌，出卖革命，致使北海党组织遭到破坏，劳锡璟、苏少芳、苏俊才等一批地下党员被捕。事发后，被捕党员在狱中宁死不屈，严守秘密，坚持与敌斗争。党组织及时转移有关人员并设法营救出大部分被捕党员，有效地降低了损失。史称“四眼刘”事件。

### 国民党加紧特务活动

1946年，广东区党委关于恢复武装斗争的决定传到南路地区后，南路人民的武装斗争更加活跃，频频出击，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国民党广东省当局更为恐慌，深感南路人民武装迅速发展，严重地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一方面调集重兵对南路人民武装发动“重点进攻”，加紧对南路人民武装的“清剿”；另外一方面加紧特务活动，妄图从内部破坏南路的中共组织。但在这异常艰险的环境条件下，北海地区地下党各游击部队仍然坚持开展武装斗争。

1946年冬，12党一五六师四六六团纠集合、灵两个县的自卫大队共1000余人，“扫荡”合浦东南地区，妄图歼灭合东南武装。吴大梅中队在南康龙门村附近被敌包围，吴大梅中队长在战斗中因伤被捕牺牲，其余人员被冲散，和中队一起活动的南康大队大队长陈普坤及其兄弟陈荣坤跑到廉江县九流埔村的亲戚家掩蔽。后因其俩将自己具有城市人衣着特征的短裤、背心晒在屋外而引起特务怀疑，于12月3日被廉江县永同乡乡长尹爵兴带队包围捕获，押至遂溪县监狱。湛江市中统南路站特务头子张辅森闻讯亲到狱中审讯诱降，陈普坤当即叛变，并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张委任他为中统琼湛站通讯员，安排他任湛江报社编辑兼四维中学教师。陈普坤供出南康三中党支部书记刘张敬和他所知道的全部人员名单。



1947年5月，在张辅森、陈普坤的阴谋策划下，陈荣坤带国民党中统合浦站站站长谢有恒等特务秘密潜回南康，妄图破坏南康地下党组织。



1947年6月，叛徒陈荣坤带国民党中统合浦站站站长谢有恒等特务到合浦南康捕捉进步学生的旧址——南康新街头32号。

在这之前，地下党组织已侦知陈荣坤将潜回南康，即布置刘张敬等撤退。6月5日，刘张敬在南康扫管龙村与姚益发、姚貽汉、韩作君等开会，商讨对策，决定会后回家与家人告别后撤退。6月6日，特务机关又派陈荣坤回合浦，配合中统特务谢有恒到南康中学逮捕了进步学生陈继芳、韩作君、刘业建、韩发积、刘家才、石世忠、石世满、郑月棠、王发宗、姚有贤、陈作享、陈景祚、金凤仙、姚信厚（姚克鲁）等14人。其中4人由于得到南康大士绅作保，当场予以释放；其余均押解至廉州，分别关押在伪专署和看守所，大部分学生被戴脚镣坐牢。特务分子还逼迫学生带路到游击区粟山、企岭等村搜捕刘张敬。刘张敬因麻痹大意而从扫管龙村返回企岭村与家人告别时，被守候在其家的特务逮捕。

刘张敬被捕后，在敌人利诱威逼下，贪生怕死，自首叛变，出卖了廉州、北海、南康地下党负责人廖铎。

### 廖铎被捕叛变

廖铎是广西桂平县人，抗战初期入党，曾在广东高雷地区任过区委、县委领导。1946年6月，为了恢复和发展钦廉四属党的工作，中共南路特派员温焯华派南路特委委员、湛江特支副书记廖铎到合浦任中共廉北联络员，负责合浦、北海

地下党的工作。廖铎曾因生活腐化犯错误受过处分。当时，由于他个人的恋爱婚姻问题不顺利，思想较消极，不愿做艰苦的地方工作，曾要求调往他处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未获准只好带着情绪来合浦工作。

廖铎来合浦所负的任务主要是：继续调查永信烟庄事件，整顿廉北党组织，审查恢复党员的组织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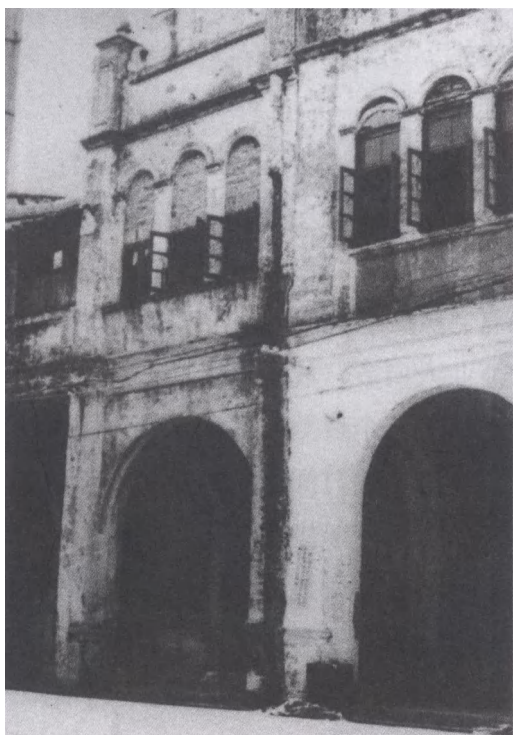
陈 华

廖铎来合浦前，考虑到北海城镇大，商业人口多，故决定以商人面目出现掩护身份，驻在北海。廖铎来北海后，先后换了三个住处：其一在文明路；其二在商会附近；其三在珠海路的永丰行，在此处住的时间最长（从1946年11月至1947年6月被捕止）。还设了6个交通联络点（其中有些是原北海党组织设立的）：（1）张树宪家；（2）广瑞祥药行（陈仲桐家）；（3）广合隆商号（陈仲桐与别人合股开的）；（4）设在珠海西路的华商行（东兴黄作兴开设，经理为地下党员巫海秋）；（5）中山东路南安客栈（陈继芳）；（6）陈家客栈附近的熟烟摊。廖铎通过上述交通联络站以及三个住处，先后与部分党组织负责人取得了联系

并开展工作。在张树宪、卢传义、岑焕祥等协助下，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考察，先后恢复了廉北区一批党员的组织生活。

9月，广东区党委任陈华为中共钦廉四属特派员，陈华到北海后以商人身份出现，并通过廖铎与钦廉四属各地的党组织联络员谭俊、陈铭金、谢王岗等联系，开展审查合浦永信烟庄事件、恢复钦廉四属党的组织关系和恢复武装斗争的工作。这时，廖铎直接受陈华领导，主要是往返于北海和南康间，做些联络工作。

1947年4月，陈华到香港向中共香港分局汇报工作。5月，陈华从香港回到北海后，根据香港分局关于华南武装斗争贯彻从“小搞”到“大搞”的方针的指示精神及形势的需要，决定大力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党组织负责人要亲自到部队抓好武装斗争，加强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并决定将钦廉四属党组织领导机关从北海转移到游击区部队中去。陈华离开北海前，布置廖铎准备撤退廉北区的党员，结束在北海的商业掩护业务，前往防城东兴接收设立在东兴和越南芒街以商业作掩护的秘密交通站。但是，廖铎却贪图安逸，害怕艰苦，迟迟不肯动身去东兴，也不给廉北区的党员下达撤退命令。



1946年9月，中共广东区党委、华南分局任陈华为钦廉四属特派员，委派其到北海审查合浦永信烟庄事件、恢复钦廉四属党的组织关系和恢复武装斗争。陈华和爱人李俊瑜到北海后，以化名邓其辉在珠海路开设店铺永泰庄为情报交通站，秘密开展工作。图为永泰庄旧址（现珠海西路71号）。

6月上旬，陈华得悉刘张敬被捕叛变的消息后，感到事态严重，考虑到安全问题，又在从公馆转移六万山区途中写密信给廖铎，指示廖铎采取应变措施：(1)结束北海掩护领导机关的生意业务；(2)撤退廉北区的党员；(3)护送李俊瑜（陈华的爱人）到越南芒街去；(4)廖铎尽快撤退到东兴。

此时，廉北区的党员已分别接到党组织通知，做好了撤退的准备，只等廖铎的命令，但廖铎迟迟不执行陈华的指示，仍然没有向廉北区的党员下达撤退命令。



国民党特务得知廖铎的情况后，极为重视，国民党广东第八区专署特警队专门组织了侦缉中队，对廖铎进行跟踪监视，并派刘张敬带领特务邓敏平等于6月21日到北海守候，准备逮捕廖铎。6月23日傍晚，在北海经商的彭尚仁（廖铎在化县教书时的学生）到永丰行探望廖铎，并相约外出逛街。当行至中山东路东二巷巷口处时，只听得一声喊叫“卢先生去哪里？”随即四、五个暴徒围了上来，拔枪相向：“不许动”，廖铎尚未反应过来便被抓了，关在合浦一中（现北海中学）附近的一间屋里。此屋是国民党第八专署特警队专为侦缉廖铎而设的临时中队部。廖铎被抓后，在特警队长邓敏平的讯问下，即供出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并要求与敌头面人物会面。

6月24日上午10时左右，第八区专署参谋王振宇和中统合浦站站长谢有恒专程赶往北海与廖铎会面。在王振宇、谢有恒一番诱降后，廖铎彻底叛变，口头出卖他所掌握的北海地下党组织的全部人员，并供出他们的姓名、住址、职业、特征等，可耻地背叛了革命。

几天后，廖铎遵照敌人的指令，书面交代有关南路共产党的情况及党的方针和活动规律等情况：(1)廖铎的个人简历及自白书；(2)党的上下级在各地的交通联络站；(3)广东省南路党的组织系统，各级党的负责人与各县党的负责人，各县重要党员干部；(4)党的方针与政策；(5)南路党的军事负责人，军事力量与分布情况；(6)党群的工作方针与工作方法等。廖铎书面材料达50页纸之多，列出了南路党政军领导人、普通党员及党外进步人士共200多人的名单，全面出卖了南路党组织情况。

## 大搜捕

由于廖铎到北海前是广东南路特委委员、湛江特支副书记，因此他向国民党特务提供的书面材料，对南路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国民党当局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在南路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围捕。幸好，南路各地绝大多数党组织领导成员和党员骨干都已参加武装斗争，部分党员也预先转移隐蔽了，因此这次事件对南路党组织的损失减到了最低限度，但在北海的地下党组织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6月26日夜至翌晨5时半，国民党第八区专署武装特务按照廖铎出卖的名单，大肆搜捕北海地下党员，先后将苏俊才、劳锡璟、吴国良、陈秉洁、林西平、苏少芳、李俊瑜、巫海秋、吴涛等党员及陈仲桐、麦佳、詹建材等群众拘捕，并押送到合浦廉州，分别关押在八区专署及警局。7月中旬，国民党特务又在北海高德乡黄屋村逮捕了地下党员黄锡豪。至此，北海党组织除陈琪等个别党员侥幸逃脱外，其余10多名党员均被逮捕，损失很大。

南康党组织由于卢传义等事前已布置撤离党员，当刘张敬、廖铎相继叛变，出卖组织及党员时，敌人虽获党员名单，但已无从下手。

### 与敌斗争

由于廖铎叛变而被捕的一批共产党员、进步群众，在敌人的监狱中备受各种摧残与迫害，饱受各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酷刑，但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凭着对党的忠诚和丰富的斗争经验，经受住敌人各种严刑逼供和鬼蜮伎俩，与敌进行顽强的斗争，严守党的秘密。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劳锡璟、苏少芳等党员。

劳锡璟是北海人，1938年入党，此后一直在党领导下工作，曾参加过白石水武装斗争，1943年下半年派返北海。经组织同意曾出任伪保长一职，并以教书为职业，从事地下工作，多次筹款上交廖铎，以作组织经费之用，甚至连爱人所有的饰物、软细都变卖了，将现款全数交与廖铎，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他被捕后，表现最为坚强，从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从不暴露组织及同志的一切秘密。敌特曾对他施加酷刑，将他双腿绑紧坐在一条长凳上，身体靠着一木柱，用绳子捆得严严实实的，使其腰腿形成直角形，再在脚跟下不断垫砖块，这就是惨无人道的刑罚——坐老虎凳。然后，敌特指派廖铎当面指证，进行迫降。廖铎无耻地劝说劳锡璟：“认吧，不认就要死的”，“你是我领导下的，你不认不行呀……”劳锡璟面对这个“上级”、“直接领导人”，只投以鄙视目光，对他的所谓指证一概否认，并怒骂“惨无人道的混蛋，害人害得惨极”，“我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害我？……”敌人恼羞成怒，不断在他的脚下垫砖上刑，使得膝盖凹了下去，脚趾几乎顶到鼻尖上面，以至昏迷过去，但劳仍坚贞不屈，宁死亦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不暴露党组织的秘密。

劳锡璟的英勇行为使敌人十分恼怒，多次上报说：“劳锡璟假借本党团身份为掩护作奸党工作，情节无可悯恕，拟请上级准予秘密处决”，企图将他处死以解恨。

情报交通员苏少芳被敌人施以电刑、坐老虎凳、吊打、灌辣椒水、拔指甲等极刑，以至被弄断了腿，她亦不承认自己的身份，敌人始终无法从她口中得到半点有关党组织的情况，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气节。此外，吴国良、李俊瑜亦表现得很坚强、镇定，敌档案上曾这样写着：“吴国良、苏少芳、李俊瑜三人经共犯廖铎所述，各人入党经过事实尚符，但经多方说服，均矢口不认加入共产党。”令敌人大惑不解，惊叹这些共产党人之不怕死。

与上述各人不同的是，吴涛采取装癫扮傻的方式，巧妙地与敌进行斗争，表现出色。其余被捕的党员及群众亦没有一个叛变出卖党组织及革命同志的。他们在狱中与敌展开了顽强的斗争，直至出狱。

敌人见在北海逮捕的党员中打不开缺口，采取了更加奸诈的手段，停止公开逮捕，故意留下廉州的党员不捕，企图麻痹地下党组织，设下放长线钓大鱼的“圈套”。集中注意力放在廖铎供出的钦廉四属的共产党领导人陈华身上。他们知道陈华在公馆、白沙一带活动，认为只要捕到陈华，钦廉四属的共产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于是千方百计想捕到陈华，调遣保二团驻防公馆随时准备以武力袭击、捕捉。

9月，因陈普坤等被捕叛变而到越南隐蔽的廉州党组织负责人岑焕祥，从越南回到廉州家中即被陈普坤的岳母刘秀英率便衣特务秘密逮捕，并送交张辅森。张威逼利诱，要岑填表自首及参加特务头子谢有恒的特务组织，受其控制使用。谢要岑找到陈华的下落，说已抓住了陈华的老婆（李俊瑜），要利用陈华老婆，设法引诱陈华。谢表示，只要捕到陈华就给岑自由，还可以给岑官做。很明显，敌人是想以诱捕的办法捕捉陈华。

1948年春节过后，谢有恒要岑焕祥到公馆游击区去找陈华。岑先到南康龙门村通过王昌锐找到钟景彰，再经白沙刘守仁交通站，到公馆浪坡村见到卢传义，再到香山村见到他从未认识的陈华。岑焕祥向陈华汇报了他从越南回来和陈普



坤、廖铎、刘张敬等被捕叛变，以及被捕人员的一般情况，并表示想设法营救被捕的人员。但不敢报告他被敌人秘密逮捕和受敌人派遣打听陈华下落的情况。陈华听他汇报后，信其所言，对他作了工作布置，并给了一些钱作为活动经费营救狱中的人员。

岑焕祥回到廉州后立即向特务头子谢有恒汇报见到陈华的经过。岑当时虽已落入魔掌，自己也背叛了组织向敌人自首，但他的良心尚未完全泯灭，想设法摆脱敌人的控制，伺机立功赎罪。在向敌人汇报陈华的情况时故意编造一些假话欺骗敌人，说陈华带有几百游击武装，战斗力很强，来去不定，防范严密，要想捉到他军事行动不行，只能用计。建议首先把陈华的老婆李俊瑜从狱中释放出来，再让她写信要求陈华来廉州或别的地点联系救她，这样才有可能把陈华引出来。敌人听后认为岑的建议可以采纳，以为捕陈的愿望可以实现。经过特务们的反复研究并请示湛江特务头子张辅森和合浦专署专员董煜（军统特务）批准，由岑焕祥将李俊瑜及其女儿保释出狱，住在岑家，日夜派特务监视作为捕捉陈华的“诱饵”。岑焕祥也为带李逃离魔掌创造了条件。

此后不久，谢有恒布置岑焕祥第二次到公馆香山村弄清陈华的具体情况以便行动。岑见陈华后向他谈了李俊瑜已被保释出狱和狱中其他同志的情况。陈给李俊瑜写了一封信并给岑一些烟土和一个戒指作为营救同志的活动经费。岑回来后，又假说陈华的一些情况并将烟土、戒指交给谢有恒，从此谢对岑更加赏识，认为一定可以抓到陈华这条“大鱼”。

时值全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解放军全面大反攻的捷报频传，国民党反动派灭亡已在旦夕，但是敌人要捕捉陈华的野心不死，特务头子谢有恒、专员董煜经过精心策划决定对陈华采取行动。7月的一天，他们派特务李廉英、李重权陪同岑焕祥到公馆以搞清楚陈华地址和活动规律，如诱捕不成，就以驻公馆的保二团重兵包围突袭捕捉。幸好此时陈华不在公馆，岑在塘背村见到卢传义，卢对岑说陈参加武装队伍到湛江去打敌人了。岑回廉州后对谢照说陈华去湛江了，敌人这次的阴谋行动又没法得逞。

7月9日，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突袭湛江市，歼敌一个营，毙俘敌数十人，当

场击毙特务头子张辅森；叛徒、特务陈普坤惊恐猝死。此事给合浦的特务以极大的震动。接着，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二十四团二连又袭击驻公馆准备围捕陈华的保二团，打伤其副团长，敌人被迫撤走，使其捕捉陈华的计划又成泡影。

不久，合浦的特务内部发生内哄，以专员董煜为首的军统特务组织把中统特务头子谢有恒逮捕抄家，谢的余党作鸟兽散。合浦成了军统的一统天下，董煜把岑案接过去亲自控制使用，董在会见岑时恭维了一番后，要岑继续为其效劳，岑当时亦着手策划逃走。当时李俊瑜被软禁在岑家里，几个特务日夜监视。岑故作镇定，假献殷勤，常主动与特务们商量捕捉陈华计划，敌人见他积极效忠，也未察觉他准备逃跑的破绽，对他更加信任。他们没预料到，岑已筹划就绪随时伺机逃跑。

8月下旬的一天深夜，突然下起滂沱大雨，敌人不及提防，岑焕祥便带着妻子招玉庆，背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以及李俊瑜等一起离家出走。经平田朝福成方向走去，后经邹锦秀、钟景彰、欧发仁等和几个交通站的帮助，来到公馆浪坡村，见到陈华、徐永源等。这时，岑焕祥才把他被敌人秘密逮捕，中统、军统特务所设圈套，他如何将计就计骗取敌人信任而营救李俊瑜出狱和逃走的经

随后，合浦县委对岑焕祥作了全面的政治审查，经过多方面考察，证实岑的交待基本属实。鉴于他能冒着极大危险带李俊瑜出逃归队，以实际行动将功赎罪，经六万山地委批准允许其重新入党。

“四眼刘”事件发生后，党组织对被捕的北海地下党员和群众进行了积极营救。党组织充分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及官员的腐败，通过统战工作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进行多方营救，并发动被捕家属各自上诉配合，终于使被捕的10位党员及其他群众先后获释出狱。只有劳锡璟、巫海秋、陈秉洁、苏俊才、陈继芳、刘业建、韩作君等直至临近解放及北海解放时才得出狱。

解放后，对涉及“四眼刘”事件的特务、叛徒，除谢有恒、董煜逃跑外，其余罪犯均被捉拿归案，分别给予惩处。叛徒廖铎被判刑监禁；叛徒陈荣坤以及特务、保安司令部参谋王振宇被判处死刑，这两个恶贯满盈的罪犯，在一阵疯狂肆虐之后，终于得到应有的下场。

“四眼刘”事件的发生，其根本原因在于陈普坤先行叛变，出卖刘张敬，刘张敬又叛变出卖廖铎所致。但是，有几点值得深刻记取的教训：(1)严重的政治思想麻痹。当合浦地下党组织得知叛徒陈普坤秘密潜回南康，阴谋破坏南康地下党组织后，立即布置刘张敬等撤离南康，到六万山区参加武装斗争，但刘张敬麻痹大意，擅自返家与家人告别而致被捕。陈华离开北海时布置廖铎撤离北海前往东兴，但廖铎却贪图安逸，迟迟不肯动身去东兴，又不给廉北区的党员下达撤退命令；刘张敬被捕叛变后，陈华又密示廖铎要迅速撤离北海前往东兴，但由于廖铎政治思想麻痹，个人主义思想膨胀，患得患失，行动拖拉，不及时给廉北区的党员下达撤退命令，导致“四眼刘”事件的发生。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2)指导思想不正确。1946年是南路党组织历史上较艰难的年代，由于强敌压境，双方力量悬殊，党组织活动困难很大。在此严峻的局势下，党组织没有及早地转移到农村去，党组织负责人，甚至已公开了的武装总队负责人也常来往于北海这个闹市联系工作，这是十分危险的，是一严重的错误。(3)个别党员意志薄弱，投机思想严重。1946年春传达广东区党委关于“广东将有十年的黑暗”的指示，虽然绝大多数党员都坚定地坚持斗争，但个别意志薄弱的党员却在这时脱离队伍，而陈普坤则充当了革命的叛徒。到1947年国共双方处于对峙状态，革命在艰难曲折中缓慢发展。刘张敬、廖铎等正是看不到革命胜利的到来，加上个人品质恶劣，投机思想严重，希望在党内得到好处，却缺乏对党忠诚献身精神。因此，一旦被敌人逮捕后，面临追求党内好处的幻想成为泡影，就很易被敌人威逼利诱所收买，在生死攸关时刻经不起考验，叛变了革命。特别是廖铎，他是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受党教育多年，曾担任过地方党组织的重要职务，但被捕后在身份尚未完全暴露，敌人尚未动用任何刑罚的情况下，便“自己解除了思想武装”，全面出卖党组织和革命同志，成为革命的最凶残的敌人。

## 六、加强统战工作拓展革命阵地

解放战争时期，钦廉四属党组织进一步加强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派人深入敌内，策反敌人，变敌为友，有效地拓展了人民武装的活动空间，扩大了革命根据地。



在武装斗争开始恢复时期，广东区党委便指示各地党组织和武装部队负责人要注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不但要争取友军和商人，对地主阶级中不同派别的人物也要区别对待，对那些受到国民党统治集团排斥的人要注意联络。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各种政治力量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面临着新的抉择。为了团结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1948年2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发出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全面而系统地规定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和对待各种政治力量的政策。并指出：“统一战线工作，最重要是强调依靠贫农，坚决联合中农，争取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小商人等。对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派或小地主成分的开明绅士、富农，则应该尽量利用他们的两面性，利用他们的矛盾，使其不反对我们或不过早反对我们，消除或减少我们发展的阻力。”

钦廉四属党组织有着重视统战工作的良好传统，许多领导干部都亲自做统战工作，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随着钦廉四属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统战工作从对象、内容到策略方法都有新的发展，在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削弱、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加速游击战争的进程以及建设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8年，钦廉四属游击战争从“小搞”发展到“放手大搞”，人民革命力量在斗争中由弱变强，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和反动统治由强变弱，农村革命根据地从形成到巩固，加上全国解放战争不断取得重大胜利，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惨败及其反动政策的丧尽人心，其营垒日益动摇分化，人民大众和各阶层进步人士都寄希望于共产党，中间人士倾向共产党。在这一总形势下，钦廉四属党组织按照党中央关于建立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集中力量，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政策，贯彻执行香港分局、广东区党委的指示，从当地实际出发，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在钦廉四属党组织的领导下，北海地区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在开展武装斗争过程中，一方面放手发动群众抗“三征”、减租减息，摧毁国民党乡镇政权，建立人民政权，进行根据地的建设，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统战

工作，同民主人士团结合作，争取中间力量，分化、瓦解反动营垒（包括不反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地主乡绅、乡保长等），对国民党乡村政权人员采取打拉结合（即武力控制与教育说服相结合）的策略，以及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争取或控制了一批乡长、保长、自卫队长及国民党政府公职人员等，使他们站到同情革命一边，为人民做点好事，起码守中立，从而壮大革命营垒，确保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1948年春，钦廉四属党组织从合浦二十四团抽调一批干部加强武工队后，公馆武工队的力量得到加强，基本控制了广大农村。在公馆至闸口一带的村庄，由武工队和朱伟率领的主力部队，根据这一带村庄大、人口稠密、地主恶霸多的特点，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同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分化瓦解反动势力，先后制服曾任国民党海南禁烟局局长李五云、陈济棠卫队军需处处长赖俊超、大地主陈玉芬等公馆区有名的地主官僚势力，打开了受他们控制的盐田、陈屋、大路滕等大村的局面，震慑了这一带地方反动势力，鼓舞了广大贫苦农民，建立了农会、同心会、担盐会、抗丁会等群众组织，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尽管这时公馆区的革命斗争环境还相当困难，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都已看到，共产党的政策是可以信赖的，人民革命必然胜利，国民党一定垮台。公馆香山村曾任国民党营长的朱贵，在共产党的影响争取下，一贯保持中立，并于1948年带领两个儿子参加革命；盐田村曾任国民党广东省揭阳县县长的李拂尘，在共产党的影响及教育下，一直保持中立态度。此外，公馆区的许多地主和保甲长，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都采取消极中立的态度，使武工队和主力部队扩大了活动区域。

中站武工队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化阻力为助力。1948年初，合浦县白花塘乡（今属石湾镇）鸦采木村副保长赖汝玑反对其胞兄赖高八叔参加武工队，鉴于赖汝玑出身贫苦，租耕地主的田地，本质是好的，只是为了避免国民党征兵而担任副保长等情况，中站武工队副队长赖洲利用宗族关系，多次登门拜访，对赖汝玑进行阶级教育和形势教育，使之转变态度，支持胞兄赖高八叔参加革命工作。随后，经过不断的教育，赖汝玑也参加了革命，并积极做上层人士的工作。1948年3月，中站武工队为了争取白花塘乡乡长陈绍福支持革命，利用陈绍福与党组织负责人朱澜清、李廉东是合浦廉中的同学关系，

通过鸦采木村开明绅士易朝伟等，把朱澜清写给陈绍福的信送给陈绍福，中站武工队队长朱有玃、副队长赖洲首先代表朱澜清、李廉东向陈绍福问好，然后向其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战争形势，争取其支持革命，并向其提出四条要求：(1)白花塘乡公所若在中站区进行“三征”，事先要向武工队打招呼，取得武工队同意；(2)国民党军队若来骚扰中站区，要迅速秘密通知武工队；(3)不干扰武工队在白花塘乡的活动；(4)双方来往要严守秘密。陈绍福首先请易朝伟等代向朱澜清、李廉东、谭俊等同学问好，并接受朱有玃等提出的四条要求。从此，中站武工队在白花塘乡的各项工作开展得很顺利。4月，中站武工队为了争取国民党合浦县参议员罗国康（曾任白花塘乡乡长）支持革命，利用罗国康是朱澜清、李廉东的中学老师这个关系，派朱有玃等到白花塘乡浊水村罗国康家里，转交朱澜清、李廉东写给罗国康的信，并向罗国康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战争形势，争取其支持革命。罗国康向朱有玃等表示，欢迎武工队进入浊水村活动，对周围一带村庄他会向绅士和群众进行宣传。因此，武工队能够在中站一带开展工作，在一些村庄建立了两面政权，使中站一带成为南联党江、西场，西通三那，东连合浦县城，北达山区的游击根据地。上洋乡副乡长何家坤与廉州党组织负责人岑焕祥的妹夫何光阔是同宗关系，中站武工队通过岑焕祥写信给何光阔、何家坤，请他们支持革命，并由赖汝玃亲自带信交给他们。何家坤于1949年6月先后两次与赖洲、徐永清等详谈，表示支持革命，并给中站武工队500发子弹，还嘱咐其父亲在上洋开的保元堂药店配药免费送给患病的武工队队员。

1948年秋，南康武工队注意教育争取中上层人士，如对雷公田保长进行教育，使之保持中立并掩护武工队。对地方土匪实行教育改造和镇压相结合的政策，有些土匪经教育后，不敢为非作歹，达到改造的目的；对屡教不改的惯匪钟喜沟则实行镇压，群众十分拥护。对反动分子则加以警告威慑，如对反动的赤江保长许林嵩、栗山保长陈世荣、地主钟乃兴等，经警告后不敢嚣张作恶，有利于武工队的活动。南康武工队通过统战工作，使南康广大农村都在武工队控制之下，武工队可以到处活动，为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常乐乡处于平原地区，武工队活动易于暴露，群众工作较难开展。因此，常



乐武工队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分化瓦解反动势力，为开展群众工作创造条件。1948年秋，常乐武工队队长黄平两次深入旧州反动堡垒吴屋，找常乐自卫中队原队长和吴屋族头谈话，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战争形势，展开政策攻心，提出解散保队，撤除哨卡，不准袭击人民武装部队，允许武工队进村活动等条件。吴屋保队慑于形势和武工队力量，一度收敛反动气焰。于是，常乐武工队顺利地开辟了旧州、皇后等一片村庄。常乐乡水尾洞保有10多个村庄，但常乐乡乡长朱子炎组织保队设卡放哨，使武工队难于进入水尾洞保的村庄活动。黄平便通过党组织，把与朱子炎有过交往的穆致昌调到常乐乡协助工作。当黄平和穆致昌率领常乐武工队到达水尾洞保时，水尾洞保队队员都熟悉穆致昌，便打开哨卡。于是黄平和穆致昌率领常乐武工队进入水尾洞找朱子炎谈判，朱子炎被迫同意武工队进入水尾洞保各村庄活动。

寨圩武工队在开展统战工作时，着重争取上层人士支持革命。寨圩中学校长覃炳璋在当地很有威信，思想进步，一贯同情、支持革命。寨圩武工队负责人蒙英翰是覃炳璋的学生，因此，蒙英翰率领武工队于1948年重返寨圩后，便与覃炳璋取得联系，覃炳璋表示将尽力帮助武工队在寨圩区开展各项工作。覃炳璋的家乡土东一带村庄的地主富户较多，封建反动势力较强大，当武工队进入土东一带村庄活动时，一些地主恶霸跑到寨圩中学报告覃炳璋，覃炳璋却向这些地主恶霸表明，这是他同意武工队入村活动的。当武工队要地主捐粮、捐钱、捐枪支持革命时，这些地主恶霸又跑去找覃炳璋告状，覃炳璋又向这些地主恶霸说明武工队队员都是好人，希望他们也支持武工队。因此，这些地主恶霸虽然对武工队又怕又恨，但慑于覃炳璋的威望和影响，也无可奈何，只好任由武工队在各村庄活动，开展各项群众工作。与此同时，寨圩武工队为了争取土东乡乡长莫杰材支持革命，利用莫杰材是蒙英翰的同学关系，由蒙英翰对莫杰材进行争取教育，晓以大义，取得莫杰材对武工队的暗中支持，使武工队能顺利地土东一带大部分村庄活动。

在此期间，北海地区党组织还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战策反工作，实行既争取又斗争的方针，一方面开展政治攻势，另一方面选派干部通过各种社会关系，

运用各种方法，对国民党官兵进行分化瓦解。1948年底，南康武工队对南康商会开展策反工作。首先选派干部找商会队班、排长的家属、亲朋进行启发教育，通过他们去做这些班、排长的思想工作，进而让他们带其亲人与武工队会面谈话，使商会队副队长等人有了一定觉醒，为最后转向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当南康武工队配合合浦二十四团进逼南康时，南康商会队副队长吴成珍于1949年5月初发动官兵20多人起义。

1948年冬，西场武工队对西坡保队开展策反工作。首先选派干部对西坡保队进行争取教育工作，逐步建立了联系。当西场自卫大队大队长陈南怀疑西坡保队“通共”，企图以检阅为名，借机将西坡保队缴械时，西坡保长黄仁德和副保长翟继庆于1949年4月30日发动官兵38人起义。随后，西场武工队和西坡保队整编为西场区中队，为了西场的解放事业继续战斗。

1948至1949年，钦廉四属各个游击根据地和人民武装通过开展统战工作及经过艰苦战斗，获得了迅猛发展，北海地区乃至整个钦廉地区开始形成农村包围敌占城镇的局面，革命形势已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人民军队由防御转入进攻，而国民党军队被迫由进攻转入退守。系，运用各种方法，对国民党官兵进行分化瓦解。1948年底，南康武工队对南康商会开展策反工作。首先选派干部找商会队班、排长的家属、亲朋进行启发教育，通过他们去做这些班、排长的思想工作，进而让他们带其亲人与武工队会面谈话，使商会队副队长等人有了一定觉醒，为最后转向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当南康武工队配合合浦二十四团进逼南康时，南康商会队副队长吴成珍于1949年5月初发动官兵20多人起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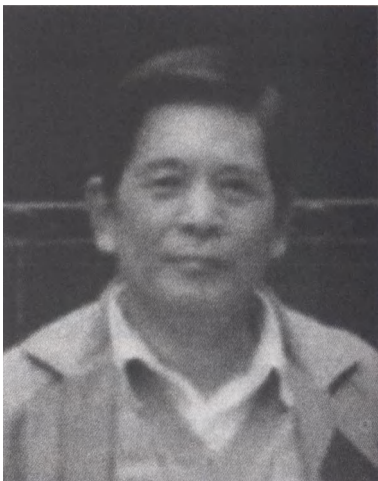
1948年冬，西场武工队对西坡保队开展策反工作。首先选派干部对西坡保队进行争取教育工作，逐步建立了联系。当西场自卫大队大队长陈南怀疑西坡保队“通共”，企图以检阅为名，借机将西坡保队缴械时，西坡保长黄仁德和副保长翟继庆于1949年4月30日发动官兵38人起义。随后，西场武工队和西坡保队整编为西场区中队，为了西场的解放事业继续战斗。

1948至1949年，钦廉四属各个游击根据地和人民武装通过开展统战工作及经过艰苦战斗，获得了迅猛发展，北海地区乃至整个钦廉地区开始形成农村包围

敌占城镇的局面，革命形势已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人民军队由防御转入进攻，而国民党军队被迫由进攻转入退守。

## 七、策反敌军护送枪支

在发展农村游击战争过程中，北海地区党组织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里，坚持英勇的斗争。1947年，在北海地区人民游击战争开展起来以后，国民党当局更加强了对城镇的严密控制，在加紧施行“清剿”的同时，实行以“杀”治民的血腥统治。在合浦、北海的城镇里，国民党军政警宪特如狼似虎，充斥着一片白色恐怖气氛。然而，面临严峻的斗争形势，北海地区党组织仍派出人员进入北海、廉州开展工作，着重加强城市情报交通站的建设，以各种手段积极侦察敌情，传递情报，完成护送过往负责干部和通讯联络任务。



姚克鲁，合浦人，195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1948年11月，为配合农村游击战争的需要，中共白龙区党总支部书记邹锦秀派姚克鲁到北海，建立合东南工委设在北海的情报交通联络站。情报交通联络站设在姚克鲁姐姐姚瑞珍家（现中山路55号），姚瑞珍为情报交通工作人员，后来又发展了两名情报交通工作人员。情报交通工作人员利用各种办法积极侦察敌情，秘密地向合东南工委、六万山地委和部队传送有关敌军的布防以及敌特、军警动态等有价值的情报；筹集粮食以便支援解放军解放北海；积极印发传单和策反信件，对国民党北海驻军发起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士气，组织广大市民保护电厂、邮局、海关、医药、银行、税局、学校，防止敌人进行破坏。1949年3月初，又在高德屋仔村姚建云家设一个联络点，负责了解北海国民党驻军的活动情况，



北海特务组织军统、中统的动态，策反盐警，运送枪支弹药等。

3月5日，姚克鲁接到合东南工委关于把北海一批武器迅速运往游击区的指示。这是一项较为艰险的任务。当时的北海正是国民党溃军南逃的重要港口城市，海上停泊数艘军舰和登陆艇，陆上有国民党“粤桂南区清剿总指挥部”总指挥张瑞贵残部、广东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薛岳残部以及国民党中央军暂编第五、第六军和第六十三军残部，还有国民党北海地方武装，敌营星罗棋布，重兵驻守，特务密布，关卡林立，稍有不慎，就有被捕危险，更不用说能够把武器运出市区了。

3月7日，姚克鲁回到南康游击区交通站——战马站，党员陈琪把藏枪地点和联络暗号等告诉他。第二天，姚克鲁紧急赶回北海着手准备。他前往高德镇屋仔村和地下交通员姚建云及游击区前来接运的陈治道等人一起商量，大家都认为在北海当时的形势看来，直接进城取枪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只能从北海找人帮助运到高德屋仔村交通站交给来接枪的同志运回。



1948年，中共白龙地区党组织派姚克鲁在北海建立的情报交通站（北海市中山路153号）

姚克鲁返回北海市区的当天晚上，整夜思考，终于想出一个妥善而安全的方案：利用国民党士兵帮助运枪出市区。领导批准姚克鲁这大胆的计划。于是，姚克鲁想方设法开展统战工作，寻找一些在北海的国民党驻军中的老乡，终于找到了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排长的南康扫管龙村老乡、姚克鲁的堂兄姚寿厚。姚寿厚

家境贫困，是被抓壮丁进国民党军队的，混了10多年只当上一名杂牌军的排长。他家中还有兄弟两家人，都是贫农，又在游击区内，他不满国民党的欺压，想找机会离开军队去经商。姚克鲁认为他比较合适的人选，便通过关系和他接上头。



陈 琪

姚寿厚夫妻和一位勤务兵租住在北海中学后门（当时为合浦第一中学正门）对面的小楼房。一天早上，姚克鲁提着两瓶好酒、1只鸡、1块肉、1只猪手登门拜访姚寿厚。对这位年轻小伙子的出现，姚寿厚并不感到突然，当得知姚克鲁是家乡来的，更显乡情的亲切。酒过两盅，姚克鲁揣测了对方的态度，开门见山地把事情提出来。姚寿厚满口答应，条件是给他30块光洋（每个士兵护送枪支费3块光洋），事情就这样定了。当时，姚克鲁就从地下党白龙地区总支书记邹锦秀所给活动经费中拿出30块光洋给他，并把运枪出市区的方案告诉他，他表示可行。

第二天早上，姚克鲁前往中山西路中山桥旁的一座楼房，找到陈琪的姐夫叶庆波，把陈琪的信交给他，并约定下午1时到珠海西路木栏店接头取枪。姚克鲁从叶家回住处吃过午饭，即往姚寿厚家，把藏枪地点和具体数字告诉姚寿厚。姚寿厚随即叫勤务兵通知4位士兵前来运枪。按约定时间，姚克鲁和4位士兵雇佣5辆黄包车抵达藏枪地点，叶庆波已早在那里等候。姚克鲁他们便一起进入屋内，把16枝六五步枪和2枝手提机枪、60枚木柄手榴弹、5000余发步枪机枪子弹等分别包扎为4大麻袋。每位护送士兵抱1袋乘坐一辆黄包车，姚克鲁乘最后一辆车，护送枪的士兵所乘坐的黄包车的车前都拉上一块雨布遮掩着，只留士兵的头部可见。这一小队通过珠海路从龙王庙转上中山路，大大方方地穿行闹市。沿路的人们看到车上坐的是国民党士兵，谁也不多看一眼。姚克鲁他们顺利地出了

市区，可是在法院附近（中山东路和茶亭之间）的军卡遇上了麻烦，前面的车停下来等待检查，姚克鲁即远远地停车观察，军卡哨兵正与前面车上的士兵争吵，在这一触即发之际，姚寿厚带着一个班的武装出现了。

姚寿厚挎着一枝 20 响驳壳手枪，大摇大摆地走向军卡的哨兵，吆喝地说：“干什么呀？”

哨兵示意要检查。

“他妈的，想找死吗？”

“长官，我们是奉命执行检查的。”

“奉命？长眼睛吗？瞧我是干什么的，这是给上级送的东西，你敢检查吗？”在这乱世纷纷的年代，强者为王，尤其当时的形势是互相包庇，互不干涉，划分势力范围，即使对方走私或运军火，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找麻烦为上，否则会有杀身之祸。

军卡上的两名哨兵瞧着他的凶势，也只得让步不管，哨兵陪着笑脸说：“既然是长官押送给上级的东西，那就算了吧！真对不起，延误了你们的时间，请多包涵吧！”

姚寿厚见对方软下来了，也顺水推舟说，后会有期。随即每位哨兵给他两包摩利士香烟（美制香烟），说：“小意思，小意思！”

哨兵挥手说，“走吧！一路平安。”

一出化险为夷的闹剧就这样结束了，姚克鲁站在后面出了一身冷汗，真担心出问题。后来姚克鲁问姚寿厚怎么会在这时出现，他哈哈地笑着说：“在这乱世之时，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不多考虑一着，意外事会发生的，我不能不更细地考虑安全嘛！”

姚克鲁怀着感激的心情，紧紧地握着姚寿厚的手说：“谢谢你，我们后会有期，别送了，请回吧！”

姚寿厚挥挥手说：“牛仔（姚克鲁的别名）再见，请代问候我的兄弟，我会回去的。”

姚克鲁他们几辆车很快地穿过公路，安全地来到高德镇屋仔村口外，这是事



先约好的地点，接枪的同志也按约定时间到达，姚克鲁随即从黄包车上的护送士兵的手中接过枪支和弹药，交给陈治道一行。

后来，姚克鲁、姚瑞珍等身份暴露，转移到游击区坚持斗争。

## 八、战斗撼山区情报立大功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为了更有效地巩固根据地和打开新的政治局面，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1949年3月，粤桂边区党委决定重新划分下辖的各区党组织，将粤桂边区调整为6个区，建立6个地委和8个支队。4月，成立六万山地委和粤桂边人民解放军第四支队，由符志行任司令，陈华任政委。

第四支队组建后，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党组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从政治思想工作入手，组织政工人员学习如何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在整训部队方面，进行“三查”诉苦运动，进行军训，加强纪律教育。在军事行动上，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以初战必胜和连续作战的指导思想进行出击。张黄初捷以后，接着打木村、南康、瓦窑岭、那丽、闸口、常乐、杨桃坳、升平、西场和陆屋等10余仗，连战皆捷。先后歼（俘）敌460多人，缴机枪10多挺，步枪几百枝和一大批弹药。其中最大的一次战斗是那丽攻坚战。占据那丽的敌人是国民党钦县保警一营、那丽警察所、钦县第五联防区和那丽乡公所的联合武装。经过3天3夜的激烈战斗，全歼守敌117人，缴轻机枪2挺，冲锋枪3枝，长短枪120多枝和弹药一批。上述一连串胜利，给盘踞合灵的敌军以沉重的打击，大大地改善了部队的装备，增强了士气，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为部队敢于打硬仗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整顿情报交通站方面，钦廉四属城乡的情报交通站是钦廉人民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建立起来的，多年来在搜集敌人情报、掩护部队活动、传达党的信息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了进一步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为南下大军提供准确、详尽的情报，完成军事任务，六万山地委对全地区情报交通站进行了统一的指挥和安排：(1)建立红旗部作为全区情报交通站的总指挥部；(2)各情报交通站人员及工作概况要上报红旗部（总部），以便加强领导；(3)各站必须及时上报所收集

到的情报；(4)加强情报人员的培训，扩大情报组织。对情报交通站进行整顿，进一步健全了各级情报交通网络，大大提高了情报的质量和利用效率，为领导机关全面掌握敌情，有效地打击敌人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外，情报交通站在为部队提供给养、联络、向导以及掩护伤病员等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贡献。

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正式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8月1日，粤桂边人民解放军第四支队正式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序列，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司令员符志行，政委陈华。



武利江伏击战地点：位于黎屋坡与绞车渡相交的武利江江湾处。

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典上，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一特大喜讯，给战斗在钦廉地区一线的战土们莫大的鼓舞和巨大的动力。

10月15日，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接到石康交通站情报员韩师琪送来的情报，获悉国民党广东省保安第一师1个营、海南特区暂编连和文利乡保队共200多人，将护送7艘盐船从合浦廉州取道武利江运往灵山。这是第四支队打伏击战的好机会。伏击这一支美式装备的省保安队，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为此，支队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分析双方形势，大家一致认为：支队在合灵地区连续打了10多仗，军威大震，敌人已成惊弓之鸟；支队士气高涨，并取得了一定的作战经验，加上现有装备和力量，有把握战胜敌人，打好这一仗。

会上，支队领导请老船工计算风力、船速，预计第二天（16日）中午，敌人将到达黎屋坡与绞车渡相交的江湾处，遂选此为伏击点。这一段江宽仅150米，地势高，岗峦起伏，杂树丛生，河水顺着两坡相夹的地方绕了一个大弯，水流湍急，有利于包围全歼敌人。当场进行作战部署，决定独立营担任主攻，十团第五连负责掩护，集中400多人的优势兵力伏击敌人。为了便于掌握全局，指挥部设在主攻部队后面，离江岸约20米的制高点上。

支队领导连夜进行战斗动员，地方干部发动群众全力支援支队的伏击行动。当地群众连夜砍竹破篾，为战士们搭浮桥，部队通过后即将桥拆除。

天亮以前战士们便进入了阵地。过了中午，没见什么动静，大家都急了。有些同志怀疑敌人不来了，有的说，也许敌人发觉四支队的行动，改变了行动计划。支队的司令员符志行坚信情报是准确的，即使敌人不来也要坚持到天黑才撤出阵地，以免被敌人发现。

战士们一直等到下午3点多钟。监视哨报告：敌人来了。敌人很狡猾派一个尖兵连在岸上一路上进行搜索。符志行命令：放过尖兵！所有伏击部队都后撤，进入丛林找地方掩蔽，待尖兵过后立即进入伏击阵地。



敌人的尖兵探头探脑，注视着沿江两岸的疑点。两岸群众表现很好，他们不动声色，照常劳动，以迷惑敌人。来敌见群众无异常反映，便继续搜索前进。尖兵过后，接着7艘满载食盐的船只浩浩荡荡逆流而上。所有船只上的敌人都站在



船头或船篷下，船舷两边架着机枪，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敌船进入了支队伏击圈，犹如瓮中之鳖。符志行立即跃出山头，向主攻部队命令：“打！”独立营的战士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来敌发起攻击。顿时硝烟弥漫，枪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呼喊声、“缴枪不杀”的口号声……连成一片，震撼着武利江两岸。指战员个个似猛虎下山岗，冲向顽抗和企图逃跑的敌人。李子汉、温其进、朱光和杨勉等几位营干部，身先士卒带头冲杀。善战连连长谢畅林，压阵迎击正面的敌人；野战连连长朱有玃带领队伍切断来敌后路；机动连连长骆廷彩带领连队截击敌人先头部队；十团第五连连长赖作亮，立即带队封锁江面，阻击向岸上冲来的敌人。敌人背水作垂死挣扎。冲上岸来的敌人，疯狂地向支队阵地扑过来，战士们毫不示弱，直向敌人冲杀，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下去。先后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船上的敌人，不是沉入江底、尸横两岸，便是举手投降。



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领导（前排左起：副司令莫平凡、参谋长陆新；后排左起：司令员符志行、政委陈华。）

江上的战斗打响后，岸上的敌尖兵连就迅速跑到两岸的双角岭构筑工事，妄图负隅顽抗。支队战士们消灭江上的敌人以后，马上转移兵力。符志行命令独立营的3个连包围双角岭。这时，夜幕已降临，夜间作战，因地形复杂，支队在低处，敌人在高处，战斗对支队不利。于是，支队决定紧紧围困敌人，绝不让一个敌人跑掉，等到天亮再消灭这股敌人。次日，天蒙蒙亮，战斗又打响了，敌人作

垂死挣扎，不顾一切拼命向支队阵地扑过来。但战士们越战越勇，班长陈秀兴看准敌人的机枪阵地，冲上前去纵身一跃，投出一手榴弹，轰隆一声就把敌人的机枪打哑了；排长陆艺带领全排人马冲入敌阵与敌厮杀；其余各连的战士也冲了过来。“不投降就消灭你们！”“缴枪不杀！”……呼声四起，不到20分钟，敌连长就带头投降了。

武利江两岸的群众闻到枪声纷纷前来助战。在地方干部的带领下，他们有的抬担架，有的带扁担，有的拿锄头……一起来帮助抓俘虏、打扫战场。运盐就忙了3天，有些群众天天下水摸敌人丢在河里的枪支。过了几天，还有人从水中捞到枪支。这一仗，全歼（毙俘）敌近200人，营长陈伟光被生擒。缴获轻机枪15挺，重机枪1挺，六〇炮1门，掷弹筒3具，榴弹枪6枝，长短枪100余枝，手榴弹58颗，各种炮弹46发，各种枪弹一大批，美国造的收发报机1部，盐船7艘。

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在合浦县武利江打了这漂亮的伏击战，震动了整个六万山区，极大地鼓舞了六万山地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使合灵武装斗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六万山地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战斗过后，四支队司令员符志行在总结武利江伏击战中指出，这次伏击战大获全胜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情报准确及时。

## 九、密建情报站策应解放军

1949年6月中旬，六万山地委委员、统战部长朱澜清布置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四支队工作人员简单到党江，找当地交通站，设法采购收音机、西药、纸张等急用物资。简单在合浦党江情报交通站工作人员邓家维的带领下，到北海找到柯佩琤，帮助完成采购急用物资的任务。柯佩琤与邓家维原是国民党白石盐场同事，当时均已辞职，柯佩琤与别人在北海合伙开了一间“绿洲”冰室。柯佩琤表示愿意承担筹捐款项，购买部队所需用品的任务，并答应介绍一些人参加工作。

在简单回山区后的两个月里，党江和北海方面的工作开展得十分积极，也很顺利。柯佩琤与邓家唯物色了好些愿意参加采购急用物资工作的对象，很快就采

购了一些游击区急需的西药以及纸张、收音机等急用物资，由党江情报交通站负责人邓雄派潘业远或许贵到北海分批转送到白石水游击区。



邓家维

7月21日，华南分局发出《加紧准备迎接南下大军的工作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抓紧时机，做好迎军支前工作。7月，合东南工委建立北海情报组，组长何醒予。北海情报组的主要任务：一是收集国民党军警特务活动情况；二是筹集一批粮食，以便供给进城的解放大军。北海情报组成员在白色恐怖的严重威胁下，不畏艰险，依靠群众，既与敌特斗争，又与资本家斗争，把收集到的国民党军警特务活动情况及时送出北海，提供给合东南工委，并控制储备了10多万斤粮食，准备支援进城的解放大军，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党江情报交通站原址(现合浦党江圩镇兴江大

道菜市巷1号)

9月底，六万山地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政委陈华派简单到北海，建立第四支队敌后工作组。简单在和党江方面联络好后，在夜间进入党江到邓家维家。随即，当晚简单又自己一个人搭小汽船去北海，近深夜才到



达柯佩琤的家（今新中路16号2楼）。简单在柯佩琤家居住，进行筹建敌后工作组。

柯佩琤原是白石盐场（在北海）的文职人员，交际颇广，先后介绍其兄弟柯君恕（佩璇）、柯哲夫（佩璋）以及吴次炎、罗传琳、曾传习、冯广陵等参加敌后工作组。不久，第四支队司令员符志行和合浦地方工作负责人朱澜清共同签署命令，批准成立“北海敌后工作组”，由简单担任组长，批准简单上报的小组成员名单。

北海敌后工作组的任务是：散发革命传单，进一步宣传党的政策；继续收集国民党的军政情报，掌握北海驻军（主要是保安团）和北海盐警中队的动态，向国民党军进行策反，收集各系统的国民党特务名单、地址；绘制北海城区简图，调查北海米商存粮情况，组织各财经单位的护产活动，组织群众迎接南下解放大军、迎接北海解放等。



北海敌后工作组部分成员，左

起：罗传琳、柯君恕、简单、柯佩琤、曾传习。

因为接近解放，北海工作更加紧张。第四支队司令部对北海敌后工作组的通知、指示和工作组向司令部的请示、汇报，均通过合浦党江情报交通站（后来转移到附近的泥江口，改名为江边情报交通站）传递。接着，北海敌后工作组在简单的主持下，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如：搞军事政治情报，收集各系统的特务名单地址，散发革命传单，邮寄宣传品，绘制北海简图，购买物品，组织群众迎接解放，组织各财经单位开展护产活动和向国民党军进行策反等。柯佩琤利用其开设

的“绿洲”冰室（今中山路 23 号）作为情报交通站，他弟弟柯君恕坐柜台兼负责传递信息。革命传单从山区发来，经江边情报交通站转送到北海，简单等人就在柯佩诤的家里重新印刷，然后大量张贴和邮寄。柯佩诤动员全家来分担各项工作：他的弟弟柯哲夫收听新华广播电台广播；柯君恕刻印油印；两个妹妹柯佩铃、柯佩珊和女儿柯曼红上街张贴和邮寄宣传品；妻子黄冰茜根据四支队司令部送来的国旗作标准缝制了几十面五星国旗，以备北海解放时悬挂；老母亲主理炊事。10 月 1 日，柯佩诤兄弟在小阁楼上用收音机收听新华社广播，当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庄严成立的特大喜讯时，工作组全体人员满怀激情。简单嘱咐柯君恕和柯哲夫立即将这个特大喜讯刻印成传单，柯佩玲、柯佩珊和柯曼红分头秘密散发和邮寄，使这个特大喜讯很快就在北海传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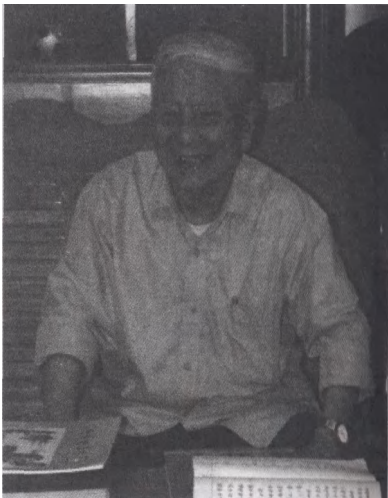


“绿洲”冰室原址（现中山路 23 号）

冯广陵曾任国民党白石盐场公署会计课长，负责了解白石盐场场长陈杰、盐警大队大队长杨宏勋和盐警大队的动态，随时向工作组提供情报。曾传习原是白石盐场职工，负责协助了解北海各单位的情况，调查北海各中学教职员工名单及各人的政治态度等。

吴次炎是一位医生，曾在国民党广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合浦）当过科长。1949 年在北海经商，和夫人程锦云挂牌开医务所。在军政界方面，交际颇广，是地方上知名人士。他由柯佩诤介绍参加敌后工作组之后，工作热情，敌后工作组多次集会都在他家里举行，以便于掩护。他利用军政界的关系，了解到不少北海、合浦军政人物的活动情况，向工作组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军事政治情

报。如广东第二军军长薛叔达（广东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薛岳的弟弟）率部开到北海的具体情况，国民党合浦、北海当局人事调动情况等。12月3日晚上（北海解放前夕），敌后工作组七、八个人就在吴家楼上召开紧急会议，听取吴策反工作汇报，并布置第二天迎接解放的工作。会议开到深夜，大家情绪异常兴奋。忽然楼下有好几个人拍门之声甚急，敌后工作组马上熄灯退入卧房内，吴次炎单独下楼开门。来者说：“共军明天就到北海，我们准备到海南，吴公你可以同去。”吴次炎劝他们可以不走，也不要抵抗，但对方不接受，几分钟之后，这些人匆忙地走了。吴次炎关门上楼，说来人是白石盐场场长陈杰，是个死硬派，他手下有200多名武装盐警。第二天（12月4日），天未亮，解放大军赶到北海。因为船少人多，国民党军还有近千人来不及上船而被俘。陈杰和盐警大队长杨宏带领盐警大队据守盐场进行顽抗，交战数小时到下午全部陈杰十分狡猾，在押俘途中逃跑，又去了海南。



罗传琳，北海人，1914年生。194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北海敌后工作组。

罗传琳原参加过国民党军统进行对日寇工作，在越南坐过日军监狱，后来越狱逃回到北海，脱离了军统，在北海经商，开“九八行”，由吴次炎和椅佩琤介绍参加敌后工作组。罗传琳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查清北海米商的库存粮食数量以备解放北海时大军征粮的任务，以买卖商人的面目出现，奔走于北海的黄德和、信和行、永济隆、永和庄、信奉行等20余间商店，随时把北海粮食变动的情况向组织报告。他还充分利用在军统的旧关系，搞到不少情报。广州解放后，国民党中央系统的特务、广东省系统的特务和北海地方系统的特务都云集到北海。薛



叔达及其部队撤来北海后准备逃往海南岛。罗传琳将3个系统的特务分子好几十人的名单住址开列出来，提供给工作组，然后由工作组上报第四支队司令部，北海一解放，马上按名单逮捕了不少特务。

与此同时，北海敌后工作组积极开展对北海、合浦国民党军政头目的策反工作，简单起草策反信后，由柯佩琤三兄弟分别抄写寄给各军政头目。策反信的主要内容是宣传革命形势，宣传党的政策，要求军政头目伺机起义，如果起义条件时机不够成熟，至少不得与人民游击队和革命工作人员为敌，不得迫害老百姓，解放军到来时不要抵抗。主要策反对象有北海水上保安连连长梁环天、国民党合浦县县长冯哲夫、白石盐场场长陈杰、盐警大队大队长杨宏勋、合浦县驻北海保安团团团长等。梁环天是合浦党江人，毕业于广州燕塘军校，与冯哲夫是结拜兄弟，手下有100多人，但梁环天对国民党前途悲观。简单商请邓雄、邓家维等，动员梁环天的堂兄弟梁星河到北海做梁环天的思想工作。梁星河到北海后，多次来往于简单和梁环天之间，商议起义的条件和方法。磨了好一段时间，有一天他来回复简单说：“对方已经原则上答应，要求和你见面。”简单与他商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但到了见面那天，近黄昏时分，梁星河急冲冲地跑来说：“对不起，对方变卦了，不来了。”表示十分不安，怕梁环天加害简单等人。简单等人镇定地安慰了他，说没关系，再等等看吧。梁星河走后，简单等人急忙吃完晚饭，准备暂时转移到曾传习家里去，以避危险。柯老太送老柯和简单下楼，到楼梯口，她差点掉下泪来。简单笑笑，表示要她放心，静静地走了。简单等人估计梁环天他们要为自己留条后路，不敢马上反过脸来。果然，梁环天不敢采取行动，简单等人在曾传习家里住了一周，又回到柯家继续开展工作。后来得知，梁环天曾经争取国民党县长冯哲夫和他一齐起义，但冯不同意。当时县府秘书徐某主张要对敌后工作组谈判代表下毒手，冯、梁不赞成，这事因此搁置。对其他军政头目的策反工作虽然也没有成功，但宣传了党的政策，颇有成效。如简单写了一封信寄给合浦县驻北海保安团团团长，宣传党的政策，并晓以大义，劝他认清形势，弃暗投明，虽未见反应，但当解放北海时，他没有率部抵抗，随后自动向解放大军投诚。除了白石盐场公署之外，北海的其他机关单位如邮局、海关、银行、税局、医院和

学校等，从领导到员工，没有一个顽抗或逃跑的，他们把各自经管的财物、账册和档案等全部都保管好，等候人民政府接收。

12月4日，解放北海的枪声一停，敌后工作组的全体成员和柯佩琚的妹妹及女儿等就一齐出动，把前天晚上预先刻好的由第四支队司令部发下中央军委宣布“约法八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拿到街上到处张贴，并把预先做好的50多面国旗按成本价供给各单位和部分商店悬挂。市区内，很快就到处飘起五星红旗。

解放后，廉州和北海分别成立军政委员会，北海敌后工作组的同志都海军政委员会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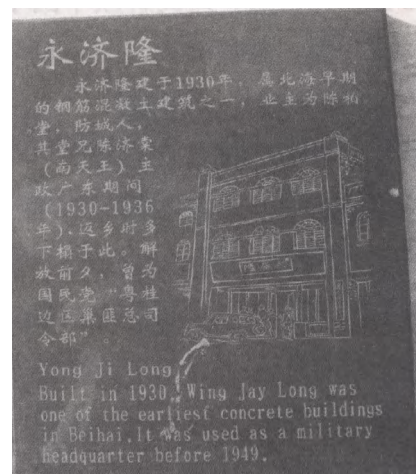
情报交通员担任解放军的向导解放北海

此外，在北海解放前夕，北海武工队则在市区东郊领导群众开展反对“三征”工作，建立革命据点，孤立北海守敌，为解放北海扫清了外围障碍。在城市建立情报交通联络站的同时，党的武装工作也从边远的山区、农村逐渐向中心城市周边靠近。1948年，公馆、白沙、南康游击区的武工队已在北海和廉州的近郊马栏、三合口、堂排一带活动，开展打击土豪劣绅、发动群众开展反“三征”的斗争。至1949年秋，南康武工队的活动范围扩展到斗鸡、大岭、红碑城、十字路到清

水江一带，对北海、廉州城形成了半月形包围之势。合东南工委也派姚克鲁率领武工队到北海东郊开辟新区，发动群众开展反“三征”斗争，恢复北海交通情报联络站与游击区之间的联系。杨华流、叶广泰、姚克鲁等人率领武工队，在由李平、蔡联锦、蔡联礼、李克等人组成的工作队的配合下，建立北海近郊的游击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为解放北海市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粤桂边游击队配合解放军解放北海



解放前夕，国民党南路剿共司令部永济隆（现珠海东路172号）